

读冯契《智慧说三篇》有感

朱 德 生

1996 年末,我接到冯契先生家属惠赠的《冯契文集》一、二、三卷(即《智慧说三篇》),读后,感慨良多。冯契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智慧”的体系,而且留下了探索智慧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体系难免有时间性的局限,而追求真理的精神却是永恒的。

—

冯契先生探索智慧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定哲学要解决现实问题,才有生命力;二是坚信哲学家要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探索的精神,才能有所创造。

他说:“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冯契文集》第 1 卷,第 3—4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种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共相”,更不是时髦的口号,而是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体现出来的极有个性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没有真切的感受,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第 6 页)

这段话使人想到 80 年代关于哲学要反映时代精神的讨论。这种讨论看到了哲学在生存上的危机,但也有不少观点形式上是为了使理论更密切地联系实际,实际上却不从自己的切肤之痛去发现问题并体会时代的脉搏,而是试图站在世界以外来说这个世界,还自以为要对之颁布悲天悯人的永恒真理。这不是无病呻吟又是什么呢?本来,理论要体现的时代精神,并不像一道数学题似的,其得数人人都是一样的;与此正相反,时代精神体现在诸多答案中,即体现在极具个性的真实的人生体验中。所以,企图通过讨论以便得到一个人人都得按此来求解的公理式的时代精神,实际上并不理解哲学如何来反映时代精神。因此,这些讨论都只能是或者不了了之,或者把政治权威的思想当作时代精神。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但是却往往把联系实际置换成为联系政治权威或时尚的思想。今天理论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便是此顽症的突出表现。为什么结果会和初衷如此背反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即不允许研究者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反思,为什么只能是一个面孔、一个声音,这是由于把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片面化了。什么叫哲学,在有些人看来,仅仅是一种作为政治工具的意识形态;所谓百家争鸣,其实是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一家是无产阶级。而一旦被认定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观点就是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它的表达方式就是领导人的语录汇编、注释。

冯契在这方面的自我反省是十分深刻的。他说：50年代以来，“有些人把理论和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使理论失去了独立性和内在价值，甚至成了整人的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紧箍咒，强加在人们头上，这明显违背民主教育的态度，使得学术自由窒息了。这种‘左’的倾向，到‘文革’时达到了极点，给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冯契并没有把问题全部推到社会环境上，而是以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拷问自己：“哲学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第18页）他特地引证了《荀子·解蔽》篇中的话：“故口可劫而使墨（默）云，形可劫而使诘（屈）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然后说：“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自由选择是可以办到的，我认为这也应该是‘爱智者’的本色”。

在那些困难的年代，有多少人会有这种自觉呢？大概不多。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便不会被人视为《李有财板话》中的“常有理”了。1978年，一位工农兵学员对我说：“我们的哲学教员都是芭蕾舞演员”。凭直觉我立即便知道他指的是“转得快、转得圆、脚跟不着地”的学风。这个批评一直使我刻骨铭心。当然，不能苛求每一个“哲学工作者”都为这个尖刻的批评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在像“文革”那样残酷的政治环境中，保持思想的自由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但这种批评令人反省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最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它既是在批判旧世界中产生的，也是在不断作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成熟的，为什么它到了中国哲学界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变成了毫无批判精神的权威思想的装饰品？

二

任何理论体系都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而构造这个体系的方法论却往往能超越这个体系及其结论，因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就冯契思想的方法而言，主要有三条：一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二是会通中西哲学，三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思想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任何一个理论家想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那就一定要贯彻逻辑和历史统一性的原则。现实中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等于理论自身的问题；只有经由本学科内在的逻辑和历史的辩证运动折射出来问题，才能成为本学科的新的理论问题，并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不经过这种加工，便把现实中的矛盾简单等同于理论中的问题，把时政宣传口号当作哲学论证的结论，这就把理论庸俗化了，甚至使理论丧失它自己应有的品格而成了一种见风使舵的投机现象。

当然，冯契在自己的智慧说三篇中，没有像上面那样明确提出问题，自然它就没有正面地来阐述理论联系实际与逻辑和历史统一性的关系。但是，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他说，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了“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第21页）这就是说，他自觉地贯彻了逻辑和历史统一性的原则。第二，他认为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握具体对象和具体真理的方法，而且他还以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举例说明之。他说这是研究认识论的基本的方法。

我之所以要把冯契没有充分阐述的逻辑和历史统一性原则突出出来，当作他构造哲学体系的第一条方法论原则，是因冯契在理论上的实际成就，都得益于此原则。反过来说，近半

个世纪来，我们的哲学成就不大，就是因为背离了这一原则，使理论走上了庸俗化和异化的歧途。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生命力之所在。但是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修养既不可能在头脑里凭空想出来，更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前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中获得。这就是从理论联系实际中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哲学是一种历史性思维，不懂得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只记某种思潮或主义的结论，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哲学的，即使是头脑中记得烂熟的结论，最多也只能是些望文生义的了解而已。

在哲学史被编入“另册”的年代，冯契能够从新时代的高度出发，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哲学史，并从中总结出自己对哲学的独立看法。他说：“当我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力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了解它时，很自然地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展开，同时它又成为中国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来，哲学当然就有了一种新的面貌，不仅不同于一般哲学教科书的那种形态，而且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第21—22页）

至于会通中西哲学，则始终是冯契哲学活动的另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就哲学而言，现实生活中即革命和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一般地说，凡是在近现代史上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因为回答了时代问题，就体现了时代精神。”（第4—6页）他认为，自己也就是要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进而会通中西，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便应该能达到一种新的哲理境界”（第13页）。

会通中西、创造哲理的新境界，并不是冯契的新发明。本世纪以来，这曾经有不少人的追求目标，而且也产生了冯友兰、金岳霖等颇有建树的人。在《智慧说三篇》中，冯契经常提到他的老师金岳霖。他自觉地要在金老等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前进，而且他确实是前进了。在会通中西、创造新哲理方向，他越过了自己的老师。他达到这种哲学境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观察现实、来总结中西哲学。他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第16页）显然，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并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独立思考的，尽管他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一代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误解。

冯契对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冲撞与会通的认识，比前人要深刻多了。他不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中西兼用”等抽象的公式与原则入手，而是从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入手，按具体问题具体讨论的办法进行。

在回忆既往时，冯契指出，近代的中国社会是个急需进行革命变革的社会，所以，这个时期，也就是要用新文化、新哲学来取代旧文化、旧哲学的革命时期。“近代哲学革命包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先进的思想家们在这两方面通过中西比较作了不少探索，是有成绩的。”（第28页）不过，离哲学领域中的革命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因为，那时从西方

学来的东西未必都能对症下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下形成的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的思维方式又根深蒂固。同时，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不能安下心来作系统的反思和全面的批判总结。结果，理论便长期处在盲目性中。

为了克服理论上的盲目性，冯契从方法论和价值观两方面比较了中西哲学传统，以期在中西会通中做到有的放矢。所谓会通中西，简单点说，就要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所以当然就要明确彼何所长、己又何所短。从思维方式方面看，中国哲学虽然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但是却缺少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和以实验为中心环节的近代实验科学方法，因而需要向西方文化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地拿来就行了，还要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结合点。“如为形式逻辑找到了《墨经》、名家作结合点，为实验科学方法找到了清代朴学的验证方法作结合点等。而所谓找到结合点，那就是经过中西比较而达到会通，有了生长点了。”（第32页）

关于生长点的提法，表明冯契对中西哲学的会通有着深刻的理解。即既要使西方的哲学为我所用，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又能由此而进一步发扬中国的传统哲学。他自己的哲学也的确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气派，他的哲学体系也是与他所理解的哲学革命的内容相一致的。

不过，他认定的思维方式方面的革命内容，似有片面性。他强调的是逻辑和科学方法，他显然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逻辑和科学方法，其理论的隐含前提，都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这种思维方式片面性，现在已成哲学关注的重点。不管西方现代哲学中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解决方案合理还是不合理，问题是真实的，不可忽视。二是忽视了非理性因素和人本主义在思维方式中的作用。在《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中，他曾经对此有所讨论，不过主要是作为化理论为德性的问题而谈的；在化理论为方法中，如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便没有讨论此问题。

对价值观念方面的革命，我以为他的理解比他对思维方式方面的革命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他说：“虽然中西古代哲学都提出了道德行为既是自愿的，又是自觉的，但相比之下，西方哲学较多考察了自愿原则和自由意志问题；而中国的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伦理学说则着重考察了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强调道德行为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并热衷于讨论道德教育与修养方法等问题。”（第33页）冯契的这一分析，言简意赅，击中要害。

同时，他还指出，到了近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个性解放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许多人又强调自愿的原则，形成了强大的唯意志论的传统，而与强调自觉原则的宿命论相对抗。即从一个极端转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而助长了一种以鲁迅所说的“无特操”为特征的社会习惯势力。冯契的这些分析似乎是对今天现状的一个写照，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最后，谈谈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冯契说：“这是一个认识论研究的根本的方法问题。”又说：“哲学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第107页）这当然也就是他构造体系时的根本原则。

他的哲学体系所以表现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形式，固然与他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内容的理解有关，也与他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性的理解有关。

冯契认为，认识论就是研究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的。不过，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这个主题中，世界和自我、客体 and 主体都是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所以认识的辩证法也就是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一致，即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一致。他说：“正是通

过这种认识的辩证运动，本然界被人的认识和智慧所明亮。功夫和本体统一，可以说物质的本体即现实世界在认识过程中展开，即精神而自我本来不是本体，是本体的作用，但功夫所至，就是本体，因而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精神越来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第 108 页）这种精神就意味着智慧，意味着自由，它不能停留在狭义的认识活动中，它必须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把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当作一条根本原则，我是非常同意的。而且，如果人们分析一下当代人类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特点，我是不能不认为，这一原则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同时，我也同意不能把哲学认识论的任务仅仅局限在认识活动，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但我不同意把知识和智慧并列起来的提法。因为，智慧不是在知识以外，排斥了智慧的知识，将丧失知识的功能。

三

下面我想就“功夫所至，就是本体”说一点想法。不过这里暂时不讨论王阳明的思想，仅仅讨论冯契的理解。冯契说：“在化理想为现实的活动中，目的因贯彻于过程而得到了实现，那么就创造了价值。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自由的精神是体，而价值的创造是用。因此我们说自我或自由的精神或自由的个性也就具有了本体的性质，这就是我常引用的‘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就是本体。’”（第 110 页）在这段论述中，冯契把创造者弄错了，不是自由精神在创造，而是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在创造。没有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自由精神什么也创造不了。这个道理简单又明了，他为什么要说精神是体呢？

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传统的旧本体论的基本缺点：即总是把本体仅仅了解为某种外在于人的给定的存在。如果外部世界对于人和对其他自然动物一样，仅仅是某种外在的给定的存在，那就既无所谓认识论问题，也无所谓本体论问题。人能改造外部世界，而且他是在改造外部世界中，才把自己改造成了人的。所以，人与外部世界决不仅仅是外在关系，同时亦是内在关系；外部世界对于人决不是给定了的，而是生成中的。因此，存在什么，怎么存在，存在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对人便成了问题。这些问题缘何而生？都是由于人在实践中有自觉能动性，或者说有了自由的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人便不满足于给定的存在（现实），总要超越它，去追求理想中的存在。从这种观点看，由精神和物质的形而上学对立出发是说明不了本体论问题的，必须从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出发才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不要一说本体，便把精神排除在外；人作为自觉的实践主体，其实是本体中最重要的一员。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没有人的世界，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是这个世界中最重要的一员。按此，冯契所说的“功夫所至，就是本体”仍然是有启发性的。

以上便是我读了冯契《智慧论三篇》的杂感。我希望冯契先生“智慧论”体系的发表，能有助于我国哲学界克服“子曰诗云”的教条主义学风。“文革”结束近 20 多年了，这种学风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要开创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冯契先生的学风便是我们的榜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李登贵